

墨子的国家间政治思想研究

李 彬

内容提要 作为先秦学者,墨子在国家间政治研究上有较强的方法论意识。他擅长使用类比法和实证法来进行学术研究,并注意规范命题与实证命题之间的差别,他甚至有统计学的概念和进行假想实验的设计。在国家理论上,墨子首创不同规模的行政实体行为相似性原理,这有助于解决先秦时期的诸侯国间关系是否等同于现代国际关系这一问题。墨子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观点是一种集体理性主义,它否定了个体理性主义,从而为我们通过非零和博弈来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开拓了思路。墨子还提倡“非攻”,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反对扩张性战争。

关键词 墨子 行政实体 相似性原理 非零和博弈 向下建构 非攻

墨子名翟,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大约生活在孔子与孟子之间,关于其生卒年份,历来说法不一,例如公元前490年—403年、^①公元前468—

^① 周才珠、齐瑞端译注:《墨子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国际政治科学》2009/2(总第18期),第61—87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76年^①或公元前480—390年。^②墨子最初学习儒学,后不满于儒家礼仪的繁琐和浪费,开始推行自己的主张。^③

《墨子》是一本记载墨家思想的著作。从行文来看,大部分内容很像是墨子学生学习笔记编辑而成的文集,^④少部分篇章可能由墨家后代学者增补。^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墨家后世门徒保持了较强的组织性,其领导人称为“巨子”或“钜子”。秦代以后,墨家陷入两千年的低潮,致使文献散失严重,《墨子》的文字亦有很多散失和错讹。清代以来,墨学重新受到重视。历代学者对于《墨子》校勘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该书的内容。^⑥本研究对《墨子》的引用、理解和评述都以周才珠、齐瑞端译注的《墨子全译》为基本依据。^⑦

本研究试图从《墨子》中提取对现代国际问题研究有直接帮助的理论、思路、观念和研究方法。与当今的国际社会相比,墨子所处年代的社会形态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需要留意这种时代变化所带来的适用性变化。现代国际问题研究已经建立起一套较为成熟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因此,我们在解读《墨子》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考察《墨子》所阐述的思想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框架的比较和衔接。我们既不是要说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源于中国先秦时期的政治思想,也不是要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墨子的思想。我们的首要目的是发现墨子的国家间政治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异同,为我们发展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提供营养和催化剂。其次,通过研究,我们试图理解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的普适性。那些跨越大洋的间距、历千年时段而相通的理论和方法,其普适性是不言而喻的。

本研究主要关注国际关系的规律,因此,军事和外交谋略不是本研究的重

① 黄济:《诸子简介—墨子篇》,《中国教师》2007年第3期,第30—31页。

② 薛柏成:《墨家思想的渊源及历史影响新探》,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6月,第19页。

③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参见《淮南子·要略》。

④ 一些篇章在内容上是重复的,仅部分文字有所不同。这可能是不同学生对同一次教学的笔记,最后都编入了文集。个别篇章可能是墨子自著。

⑤ 关于《墨子》各篇来源的综述,参见李光辉:《〈墨子〉成书年代及著者考证综述》,《殷都学刊》2006年第4期,第102—105页。

⑥ 历史上《墨子》相关版本承续关系的综述,参见张炳林:《略说〈墨子〉重要版本的传承关系》,《山东图书馆季刊》2005年第2期,第119—122页。

⑦ 周才珠、齐瑞端译注:《墨子全译》。

点内容。《墨子》记载了墨子及其门徒的一些军事和外交谋略,但本研究只考察和梳理这些谋略背后隐含着的国际关系规律。本研究也主要通过解读《墨子》来总结墨子及墨家学派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墨子之后的墨家学者的贡献远远低于墨子,少量的创新也记录在《墨子》之中。因此,本文简单地将墨家学派的思想、墨子的思想以及《墨子》所阐述的思想看作是一样的。行文的时候,不加区分地使用“墨子认为”、“《墨子》认为”、“墨家学派认为”这三种表达方式。

本文首先探讨《墨子》所反映的学术特色,然后分别考察墨家学派对国际关系行为体的看法、对囚徒困境(安全困境)问题的看法以及对扩张性战争的看法。

一、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对《墨子》中的政治和伦理思想,现代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有些文章提出了一些对国际问题研究有重要启发意义的看法。比如,有作者指出,墨子的伦理思想可以为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提供基础。^①徐希燕是为数不多的、直接将墨家学说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比较的学者。她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看法,认为墨家关于互助和依赖的思想类似于自由主义的相互依赖;墨家关于联合弱国抵抗强国的思想类似于均势理论。^②《墨子》中的确出现了上述思想的萌芽,例如,墨子提出一些非军事的安全威胁,类似于非传统安全的思路,但是,她并未在《墨子》中进一步发现这方面的明晰证据。

有研究者指出,墨子承认人是自私的和理性的。^③该研究由此认定兼爱是无法实现的。应该说,在个体理性假设下,的确会得到这样的推导结果。可是,这种看法并不完全符合《墨子》的原意。已有文章指出,《墨子》认为“兼爱”的

① 王联斌:《墨子的军事伦理思想》,《军事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第143—149页;赵建文:《墨子关于“兼爱非攻”的国际法思想及其现代价值》,《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第132—134页。

② 徐希燕:《墨子的国防战略与国际关系思想研究》,《管子学刊》2000年第2期,第63—66页。

③ 刘天旭:《论墨子国家观的基本倾向》,《平顶山师专学报》2003年第6期,第76—78页。

价值观是可以塑造出来的,这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建构主义思路相近。^①可惜该文没有明确指出这种价值观的塑造路径。另外,钱永生从博弈论角度讨论了墨子游说楚国打消攻打宋国的念头的过程。这篇文章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墨子所进行的是“理性”分析,即利益分析。^②但是,这篇文章对博弈矩阵个别元素的赋值可能有误,下文将详细解释。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是否与现代国际关系类似,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桑东辉以《墨子》为例,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③他认为,“在墨子等人眼里,诸侯国是具有一定主权、在周王朝之下的半独立邦国。”胡锐军等将诸侯国一般性地称为“政治主体”或“政治实体”,^④这是看待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后面将进行详细讨论。

也有一些学者将墨家的安全观(或者战争观)看作是中国战略文化(或者外交文化)的代表。^⑤人们通常将《孙子兵法》作为中国战略文化的代表。^⑥可是,这些学者认为,《墨子》代表防御性军事谋略,而《孙子兵法》代表进攻性军事谋略,两者在很多地方表现出对立。^⑦由于在谋略上,《墨子》和《孙子兵法》有如此鲜明的不同,墨学又曾经是显学,因此,上述这些研究可以给出一个简单的推论,那就是,仅将《孙子兵法》看作是中国战略文化的代表是不恰当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实际情况可能是,诸子百家对中国战略思路都有影响,不同时期的不同决策者对诸子百家有不同的偏好,因此,不一定存在着一个单一而且

① 李昭昊:《墨翟和平观的哲学基础》,《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61—65页。

② 钱永生:《对〈墨子·公输篇〉的博弈分析和语用分析》,《职大学报》2005年第1期,第15—19页。

③ 桑东辉:《也谈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是否为主权国家:以〈墨子〉为例、以国际法为视角》,《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第137—149页。

④ 胡锐军、杨占国:《墨家政治文化新探:墨家政治冲突与政治整合思想研究》,《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15—20页。

⑤ 何芳:《从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看中国“和文化”的底蕴和意义》,《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4—7页;朱建婷:《论当代中国外交战略的文化因素》,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第18页。

⑥ 这方面的简述,可参见包国俊、于森:《开创中国兵法研究的新局面:第6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胜利召开》,《军事历史》2004年第6期,第74页。

⑦ 徐希燕:《孙子与墨子军事思想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第69—75页;熊泽文:《〈墨子〉的防御之术与古代军事防御理论之奠基》,《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2期,第79—82页。

恒定的中国战略文化。

《墨子》包含了大量关于军事思想和军事科技的讨论,涉及军事威胁、军事动员、军事装备建设和使用、作战组织和后勤,等等。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和重现《墨子》的军事思想、安全观以及它的“非攻”、“救守”的策略和思路,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很有帮助。^①也有一些文章讨论了墨家流派对战争起源、战争类型的看法。^②对于战争的根源,“不相爱”被看作是根本原因,统治者贪婪、好大喜功等也被看作是具体原因。多数学者认定,墨家流派反对的主要是侵略战争,提倡积极防御。也有少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墨家流派是反战的和平主义者,其主张有时背离历史潮流。^③本研究认同前一种看法,即《墨子》只反对“攻”这种类型的战争。

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墨子》一书表明,墨子的学术研究方法具有非常强的科学性。钱钰认为,墨子具有重经验的实证精神、重逻辑分析的理性态度和重实用的科学价值观,他还认为,“方法”这一词也系墨子所创。^④本节重点讨论《墨子》在分析国家间关系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学术特色,尤其是科学方法论的特色。

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往往一身三任。作为研究者,他们需要进行思想探索;作为教师,他们需要培养弟子;作为智囊,他们需要为当权者提供政策建议。在上述这些活动中,类比是一种利器。在研究中,类比可以帮助思想者揣测未知的领域;在教学中,类比可以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在政策咨询中,类比可以加强对决策者的感染力。所以,中国先秦的思想家大都是类比大师。墨子也非常善于类比。为了说明在国家治理中尊重人才(尚贤)的重要性,墨子将尊重政

① 秦彦仕:《〈墨子·备城门〉诸篇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秦彦仕:《墨家12种攻守方式》,《职大学报》2005年第3期,第6—8页。

② 孙中原:《墨学通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254页;秦彦仕:《〈墨子·备城门〉诸篇综合研究》,第91—117页;陈逢治:《论墨子“善守御”的军事防御策略》,《齐鲁学刊》2006年第5期,第27—31页。

③ 黄朴民:《〈墨子〉军事思想简论》,《东岳论丛》1995年第3期,第74—87页。

④ 钱钰:《墨子的科学教育思想概观及其启示》,《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89—91页。

治人才与雇请好屠夫宰杀牛羊、雇请好裁缝缝制衣服进行类比。^① 由于宰杀牛羊、缝制衣服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雇请屠夫和裁缝是贵族们的普通选择,这种类比使得贵族们很容易在墨子的引导下,联想到政治人才的重要性。在墨子游说楚国的过程中,墨子假装雇请公输盘做杀手,而公输盘认为做杀手有违道德而加以拒绝。然后墨子就拿做杀手与攻打宋国类比。见到楚王的时候,墨子对楚王讲述富人做小偷的故事,引起楚王鄙视这种现象。然后,墨子就拿这个现象来类比楚国攻打宋国。^②

墨子虽然善于类比,但是他并没有止于类比,这与先秦时期的其他思想家有很大的不同。类比具有启发思考的作用,但是类比不能代替论证,因为类比不够严谨。以庄子在“子非鱼”故事中的类比为例。^③ 庄子感叹:“水中的游鱼真是快乐啊”。惠子批评庄子:“你不是游鱼,你怎么知道它是否快乐呢?”庄子反驳惠子:“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的逻辑是,庄子和鱼是两个个体,惠子和庄子也是两个个体,因此,如果庄子不了解鱼的心情,惠子也不会了解庄子关于鱼的知识。可是,这个类比中的两个案例之间差异明显。庄子和鱼是两种不同的生物,双方沟通较难;惠子和庄子同属人类,沟通较为容易。庄子偶遇这条鱼,对这条鱼未必熟悉;惠子与庄子早有交往,彼此熟悉。因此,惠子对庄子的了解要比庄子对这条鱼的了解深入得多。可以看出,庄子的类比缺乏逻辑上的说服力,他的反驳只是在语气上显得有气势。

从《墨子》来看,墨子了解类比在逻辑证明中的缺陷。因此,墨子仅利用类比来启发思考、增加感染力而不用其来做证明。在“墨子使楚”^④一段中,墨子将受雇做杀手与发动战争类比,虽然使得公输盘无话可说,但是,公输盘并不因此放弃战争;墨子将楚国攻打宋国的计划与富人做小偷进行类比,虽然也使得楚王惭愧,但是,楚王并未因此放弃攻打宋国。如果墨子只是依靠类比来进行游说,显然,这次游说不能成功。墨子游说成功的关键在于他改变了战争的利益分配,并论证了其可行性。可以看出,在整个游说过程中,类比只是墨子启发对方思考的一个引子,墨子并没有将类比作为对方决策的依据。对这一问题的

① 《墨子·尚贤中第九》。
② 《墨子·公输第五十》。
③ 《庄子·秋水·子非鱼》。
④ 《墨子·公输第五十》。

详细讨论见第五节。在讨论国家问题(内政及对外关系)的时候,墨子多次将诸侯国与家庭类比。这里,墨子并非随意地拿这几个对象进行类比。墨子认为,诸侯国、家臣的封邑、家庭等只是规模不同的政治实体,其行为是相似的。这样,墨子的类推就是一条专门的命题,需要专门的论证。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详见第三节。

墨子认识到类比在学术证明中不可靠,因此,他主要依靠实证来进行学术探讨。为了说明“兼相爱”可以成为一种稳定的偏好,“交相利”可以成为一种稳定的社会状态,墨子采用了案例证明法,列举了《泰誓》、《禹誓》、《汤说》、《周诗》等历史文献中的事例。由于墨子只是要说明一种可能性,因此,有限枚举就可以了。^① 为了论证上级塑造下级偏好是可能的,墨子列举了三个案例:晋文公塑造下级穿破衣服的偏好、楚灵王塑造下级饿肚子瘦身的偏好、越王句践塑造下级轻视自己生命的偏好。^② 同样,在这里,墨子也只是说明一种可能性,因此,有限枚举就可以了。在此,墨子对案例的选择是非常考究的,他说:“乃若夫少食恶衣,杀身而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难也,若苟君说之,则众能为之。”^③ 也就是说,忍饿节食、穿破衣服、轻视生命都是人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可是,只要君王鼓励,大家就可能形成这种偏好。墨子有意选择极端不利条件下的案例,如果这些案例能够成立,那么,一般条件下的案例也就能够成立了。

墨子甚至有统计学的概念,并对此进行了明晰的说明。他指出,一个医生制出一种药,专门治疗一种疾病。若一万个得病的人服用后,仅仅四、五个人有疗效,就不能说这种药有效。孝子不会给父母服用这种药,忠臣不会给君主服用这种药。^④ 因此,仅仅列举几个特殊的案例,并不一定能够有效证明一个命题。墨子运用这样的统计学概念来批驳扩张有利的理论。他指出,与周朝建立初期的万国相比,仅仅楚国、齐国、吴国、晋国等少数几个国家扩张成功,这不能说明扩张有利是普遍有效的理论。

假想实验是科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例如,一个滑块凭借惯性在一个平面上滑动会逐渐减慢速度停下来。滑块和平面越光滑,滑块能够凭借惯

① 《墨子·兼爱下第十六》。

② 《墨子·兼爱下第十五》。

③ 同上。

④ 《墨子·非攻下第十九》。

性走得越远。设想如果滑块和平面无限光滑,滑块就会无限地走下去而不会停下来。这就是惯性定律。因为现实中很难做到无限光滑,上述过程就只是一种假想实验。这种假想实验可以帮助研究者发现科学规律。墨子也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来推测社会规律。在讨论价值观的社会选择时,他设计了一个社会心理假想实验:两个人分别偏好集体利益和偏好个人利益,这两个人被贴好标签,放在被测试的人们面前,由被测试的人们挑选其中一个作为朋友。结果不难想象,偏好集体利益的那个人会被普遍地选择为朋友,而偏好个人利益的会被淘汰。^① 墨子并未真正地进行这个实验,他只是细致、明确地描述实验条件和规则,结果自然就出来了。

三、行政实体行为的相似性原理

将主权国家看作国际社会中的基本行为体,这是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最主要的一种研究思路。在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中,国家不仅被看作是国际事务中的基本行为体,而且被看作对利益有自然的追求。建构主义原则上可以选择任何共享观念的群体作为基本行为体,而在实际的研究中,建构主义者往往也选择国家作为共享观念的行为体。也有一些理论关注次国家行为体(例如国家内部的某个地区)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可是,次国家行为体的这种影响往往只被看作是对国家基本行为的有限偏离。可以说,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与其他层次的人群组织相比,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极少有人将国家与家庭类比,这种类比往往被看作是天真和业余的表现。教科书的典型语言是,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国家奉行自助原则;国家主权体现为对内最高,对外独立。在此种情形下,国家间关系与我们常见的家庭成员间关系有着天壤之别。

可是,墨子却反复将国与家进行类比。在他看来,从家庭到天下,人类群体组织的规模是一个从小到大逐步过渡的关系。在政治上,这些从小到大的不同规模的群体组织之间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故曰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② 从自

^① 《墨子·兼爱下第十六》。

^② 《墨子·尚同下第十三》。

上而下的顺序来看,天子分封诸侯,诸侯领有诸侯国;同时诸侯在其疆域内又分封家臣,这些家臣也领有各自的封邑;通过这样不断的分封,人群组织的规模不断缩小,直至家庭。^① 在这里,《墨子》讨论的人类群体组织是一类特殊的群体组织,其不同于军队或者学校。这类组织具有以下基本特点:组织拥有特定的土地以及其他财产;组织的行政首长要进行内部治理,尤其是安排内部生产活动以维持生存;组织需要保护内部成员安全;组织要与其他组织打交道。胡锐军和杨占国将《墨子》中提到的诸侯国等一般性地称为“政治主体”或“政治实体”。^② 借鉴这种说法,本研究将这些组织(包括诸侯国)称为行政实体。

在墨子看来,不同规模的行政实体构成一个相似结构的嵌套:一个行政实体里面还有更小规模的行政实体;一个大规模的行政实体的行为与其内部小规模行政实体的行为存在着相似性。例如,天子将天下分封给不同的诸侯国,诸侯国里面又有家臣的封邑,而家臣还可以给自己手下的豪强赏赐庄园。天子与诸侯的关系类似于诸侯与其家臣的关系;诸侯与其家臣的关系类似于这些家臣与手下豪强的关系。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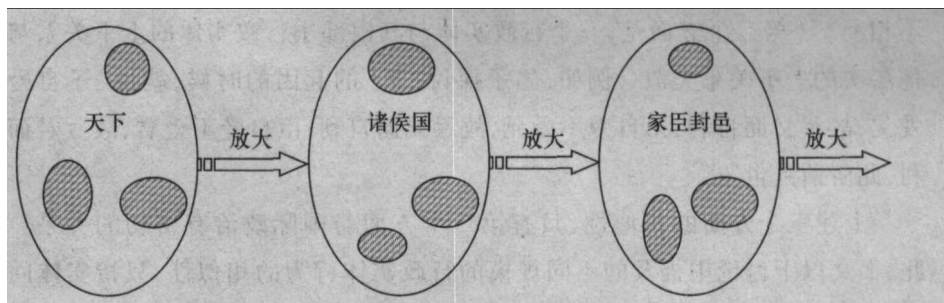


图-1 墨子对不同规模行政实体结构的看法

在图-1中,左边的大椭圆表示天子所占有的天下,内部的三个小椭圆表示天子分封的三个诸侯国及所领有的封地。将其中一个诸侯国放大,得到中间的大椭圆。这个大椭圆内部的三个小椭圆表示诸侯分封的三个家臣及所领有的封邑。将其中一个家臣的封邑放大来看,得到右边的椭圆,椭圆中间还有小椭圆,这就是家臣进一步分封的豪强。天子、诸侯、领有封邑的家臣、领有庄园的

① 《墨子·尚同上第十一》。

② 胡锐军、杨占国:《墨家政治文化新探:墨家政治冲突与政治整合思想研究》,第15—20页。

豪强,它们的结构具有相似性。这种现象可以表述为如下的命题:不同规模行政实体的结构具有相似性。我们称之为:不同规模行政实体相似性原理。按照这一原理,从大到小,从天下到家庭,不同规模行政实体的结构是类似的,并没有哪一个层次具有很强的特殊性。

墨子提出的这种相似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群体内部相似性。例如,对行政实体首长的要求是类似的。“……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国家,官府,邑里,此皆国之贤者也。”^①这属于国内(政治实体内)的治理问题,不是本文的讨论重点。第二个方面是不同层次中每一层次行政实体间关系具有相似性。墨子认为,在同一个规模层次上,不同行政实体互相攻击源于这些实体“不相爱”。墨子的看法如下:“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②第三个方面是,一个行政实体与其内部小行政实体的上下关系与其他层次的上下关系类似。例如,墨子探讨“乱”的起因的时候,就说“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③

上述三个方面的相似性,只有第二个方面与国际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以下讨论中提及的不同规模的行政实体行为的相似性,只指实体间关系的相似性。根据墨子的相似性原理,可以将对一个层次的行政实体的知识推广到其他层次。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详细研究一个层次的行政实体现象,并找到规律,就可以把这个规律推广到其他规模层次的行政实体。例如,墨子的一个常用研究方法是,首先考察家庭现象(家庭内成员关系、家庭间关系),得到规律性的认识。然后根据相似性原理,墨子就可以根据家庭现象的规律推测国家现象。在考察“兼相爱”的作用和意义时,墨子的分析是:“视人之国若视

① 《墨子·尚贤中第九》。

② 《墨子·兼爱上第十四》。

③ 同上。

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①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不同规模的行政实体行为相似性原理的运用。

墨子的相似性原理和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行为体”的假定,都是对国际现象的简化描述。两者最明显的差异是,不同层次政治实体对外交往的权利和机会分配不一样。墨子的相似性原理默认各个规模的行政实体都有对外交往的权利和机会;国家行为体假定则默认,对外交往的权利集中在主权国家的决策者手里,其他层次的人群组织对外交往的权利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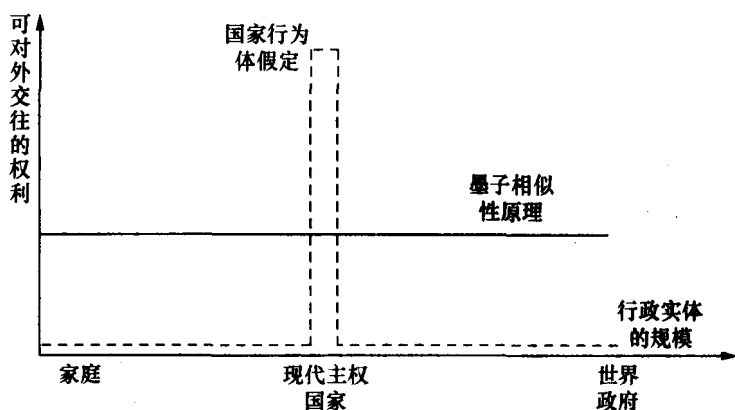


图-2 行政实体的规模与对外交往的权利

图-2中,横轴表示行政实体的规模,纵轴表示行政实体可对外交往的权利和机会。实线表示墨子相似性原理。实线大体上是水平的,表示各个层次的行政实体对外交往的权利大体相当。虚线表示国家行为体这一假定。虚线高度在各个地方都接近于零,只有在主权国家的位置突然跃升到很高。这表示只有主权国家的决策者才有对外交往的权利。这两个假定与社会现实都有差别,见图-3。

图-3中,横轴仍表示行政实体的规模,纵轴仍表示独立地参与交往的机

① 《墨子·兼爱中第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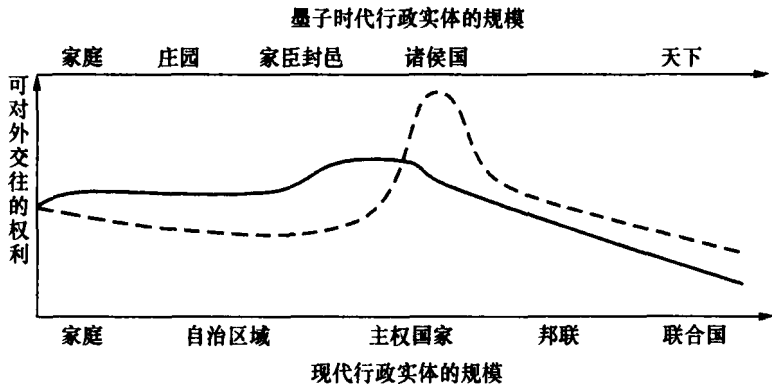


图-3 人群组织的规模与运用权力的机会

会。实线表示墨子时代各个层次行政实体对外交往的权利。实线的大部分地方比较平,表示当时不同层次行政实体都有对外交往权利。但是,实线也不是完全水平的,这表示不同层次行政实体对外交往权利还是有所差别。例如,当时一些诸侯国国君开始集权,他们获得了较大的对外交往权利,而诸侯国内部更小的政治实体可能就因此失去了一些对外交往的权利。虚线表示现代社会各个层次行政实体对外交往的权利。在主权国家的位置,虚线突起,这表示现代社会主权国家决策者对外交往的权利的确相对较多,可是,其他层次仍有不可忽略的参与交往机会。例如,国内的自治区、政府间国际组织等,都有机会参与对外交往。与实线相比,虚线在主权国家的位置要向上突起一些,这表示现代社会权利的确向主权国家决策者汇聚。在一定程度上,墨子的相似性原理和国家行为体假定反映了这种历史演变,但是,二者都没有精确描绘客观现实。

按照行政实体规模来分配对外交往权利与机会,这并不是墨子相似性原理和国家行为体假定的唯一区别。由于国家行为体假定忽略主权国家之外所有其他层次行政实体对外交往,因此,这一假定不需要对主权国家之外的行政实体的行为特点进行任何具体描述。墨子相似性原理假定各个层次的行政实体都有机会和权利进行对外交往,因此需要对各个层次行政实体的行为特征给予描述。墨子相似性原理认为,各个层次行政实体的行为特征是一致的。

尽管时代变化导致对外交往的权利分配发生了变化,但是,墨子相似性原

理的价值仍然很大。现代国际问题研究中渗透着墨子的相似性原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行为体通常是人格化的,也就是对照人的行为特征来寻找其他层次行政实体的行为特征。例如,国家行为体理性假定就是借鉴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定。而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经济体。

在现代国家的构建中,较低层次的行政实体往往将国防和外交方面的决策权让渡给国家的中央政府。因此,在这些所谓“高级政治”问题上,主要是国家层次在行使对外交往的权利。对“高级政治”问题的描述,国家行为体假定可能更接近实际。而当代国际政治研究越来越多地关注“低级政治”问题,例如,经济、环保、流行病等。在这些问题上,次国家的行政实体有更多的发言机会和决策影响力。在开拓对国际社会中“低级政治”问题的研究时,国家行为体假定不一定是最佳的出发点。借鉴墨子关于行政实体相似性的原理,考察次国家层次的行政实体的相互交往,这可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思路。实际上,在所谓“高级政治”问题中,例如,在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中,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本文推测,墨子的行政实体相似性原理有可能作为国家行为体假定的一个替代思路,在今后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墨子关于行政实体相似性的认识,还解决了一个较为重要的方法论问题,那就是《墨子》以及其他先秦时期的经典作品是否能够为我们研究当代国际问题提供帮助。按照墨子的思路,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层次政治实体的关系是相似的,因此我们就不必要顾虑先秦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是否是国际关系,完全可以研究先秦经典作品,整理其中与国际关系相关的概念、理论与方法,为推进当代国际问题研究服务。

四、非零和博弈与向下建构

对抗和合作是当前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很多这方面的研究都会追溯到囚徒困境模型。两个国家(个人)在交往中,可能双方得利,也可能一方得利,甚至有可能双方都受损。这样一些现象可以用囚徒困境来描述。见表-1。

表-1 囚徒困境

		乙	
		对抗	合作
甲	对抗	(-1, -1)	(2, -2)
	合作	(-2, 2)	(1, 1)

表-1 中甲和乙都是博弈的参与者,他们若合作,双方获益;他们如对抗,双方受损。这一博弈的解(纳什均衡)出现在矩阵的左上角:双方都选择对抗,结果双方受损。这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模型,左上角这个解也称作对抗解。按照墨子的相似性原理,这一结果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其他规模的行政实体,例如,两个家庭、两个诸侯国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博弈双方都受损的现象呢?《墨子》指出:“……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①也就是说,博弈参与者在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伤害了对方,从而导致了双方利益受损。这正如有些研究所指出的,墨子承认人(行政实体)是自私的和理性的。^② 博弈的结果是:出现各方利益受损的对抗解。

这一博弈模型可以描述很多社会现象。大厅内聚集了很多人,他们分成很多小组各自交谈。一个人为了同伴听得更清楚,就提高声调。其他小组的谈话人因此就听不清楚了,于是也提高声调,整个大厅内顿时就变得嘈杂不堪。道路上一辆车为了自己快行而不按次序行走,其他车受到干扰也不按次序,整个道路就堵塞了。一个国家发展军备以自保,其他国家则感到不安,因此,也增加军备自保,于是,军备竞赛就出现了。最后一种情形就是“安全困境”现象。

可是,很多社会现象并没有像囚徒困境博弈模型所预言的那样必然出现对抗状态。例如,很多人在一个大厅内分别交谈,大家都很克制地小声交谈,大厅内总体上保持安静。在没有警察管制的道路上,车辆往往也都能够保持靠右行驶。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囚徒困境并未出现博弈论所预言的对抗解,而是出现

① 《墨子·兼爱上第十四》。

② 刘天旭:《论墨子国家观的基本倾向》,第76—78页。

了表-1中右下角的合作解。为了说明这种合作解的来源,博弈论研究者提出了无限次博弈的思路。也就是说,博弈者为了在下一一次博弈中获得有利的结果,只好在这一次博弈中保持克制,实行合作。^①例如,大厅内一个人原本想大声说话,但是,担心自己大声说话会引起其他小组的人也大声说话。别人大声说话反过来会盖住自己的声音,使得自己谈话更困难。为了避免别人的负面反应随后给自己带来损失,这个人就会克制住自己的声音,只好小声说话。这一理论能够部分地解释某些现象,例如,解释长期博弈中的合作。但是,这个解释在很多时候也很无力。例如,大厅内很多小组在组内交谈。一个小组准备结束交谈了,因此,这个小组的人就不用再担心其他小组高声说话会盖住自己的声音。按照上述的无穷次囚徒困境博弈对合作的解释,这个小组的人可以高声说最后几句话,反正他们已经不用担心其他人小组的反弹了。这样,整个大厅就乱了。可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情景是,很多结束谈话的人悄悄地离开了。也就是说,即便不是无穷次博弈,囚徒困境也会出现合作解。那么,如何解释这种情况下囚徒困境的合作解呢?

当代博弈论采用无穷博弈来解释合作解(共赢结果)中人们对损人利己行为的克制。这一解释无法说明人们(行政实体)在很多短暂行为中对损人利己行为的克制。例如,上述大厅内谈话的例子,即使人们结束谈话的时候,也不会高声干扰别人。墨子对这种囚徒困境关系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完全不同于现代博弈论的解释。囚徒困境模型的合作解在“墨子”的术语中就是“交相利”,意思就是人们(行政实体)在相互交往中都获利,或者说共赢(win-win)。表-1左上角的对抗解在《墨子》的术语中称为“乱”。墨子认为,乱的来源是人们(行政实体)不相爱,或者说是损人利己(“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②在行政实体内部的治理上,墨子用不相爱解释“乱”的起源。一方面是下级不爱上级;另一方面是上级不爱下级。在不同的行政实体之间,墨子也用不相爱解释了“乱”的起源:“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

①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216页。

② 《墨子·兼爱上第十四》。

起?皆起不相爱。”也就是说,每个行政实体的决策者都只顾追求本实体的利益,而不考虑其他实体的利益,这样就会出现对抗,各方利益都受到损失。^①墨子在考察了表 5-1 中左上角对抗解“乱”的来由之后,提出了实现该表中右下角的合作解的思路:“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②这一思路,简单地就说就是“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具体来说,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③

按照墨子的思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同于现代博弈论对囚徒困境合作解的解释。在大厅里面一群人在分别交谈。一个人如果大声说话,会干扰别人。如果这个人“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也就是说,他不愿意受到别人的大声干扰,自己也不愿意大声干扰别人。这样,整个大厅就安静了。他自己最终获得了安静的交谈环境。在表-1 所示的囚徒困境中,如果每个参与者追求个体利益而不顾及他人利益(墨子将这种行为称为“别”),则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对抗、导致双方利益受损(墨子将这种状态称为“乱”)。即使博弈能够无穷重复下去,一些扰动也可能导致“乱”,而使得各方利益都受损。如果每个参与者能够“兼相爱”,则必然实现“交相利”。这里面的逻辑是:“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④“兼相爱”与“别”成为囚徒困境中形成合作解与对抗解最为重要的原因。这一分析是中肯的,符合实际的。如果司机们都不管别人行车的方便,只管自己行车快,那么必然导致交通混乱(“乱”)。如果司机们都顾虑别人行车的方便,那么就会克制自己抢行的冲动,从而保证了行车秩序,所有的车行驶起来就都方便了(“交相利”)。按照现代博弈论无穷次重复博弈的思路,司机们在自己快要到终点的时候都会狂飙起来,这与现实往往不相符合。

现代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学派(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以行为体的利益为出发点,假定行为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称之为理性行为。这种个体理性行为就是墨子所说的“别”。现代博弈论以个体理性为出发点,

① 《墨子·兼爱上第十四》。

② 同上。

③ 《墨子·兼爱中第十五》。

④ 同上。

试图解释集体理性(共赢的合作解)出现的原因。在面对很多实际社会情形(道路的例子、大厅内谈话的例子)的时候,这种解释显得非常勉强。墨子则认为,人们(或行政实体)既有可能以个体理性(别)为出发点,也有可能以集体理性(兼)为出发点。以个体理性为出发点,则可能会出现“乱”这种对抗解;以集体理性为出发点,则会出现“交相利”这样的合作解。因此,在墨子的理论体系中,集体理性不是个体理性推导出来的。集体理性(兼)与个体理性(别)是两套不同的价值观。博弈参与者可能奉行这两套价值观中的一个。这是导致“乱”和“交相利”两种不同结果的根本原因。图-4给出了按照墨子理论对囚徒困境中进行的决策树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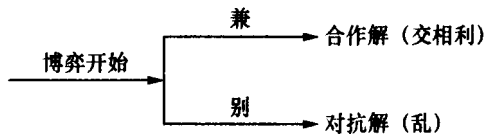


图-4 囚徒困境合作解与对抗解

图-4中,如果博弈参与者选择“兼”的偏好体系,则博弈出现合作解;如果参与者选择“自爱不爱他人”的“别”的偏好体系,则博弈出现对抗解。这种对合作与对抗产生根源的解释对我们有非常重大的启发意义。

“兼相爱”是否能够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呢?一些人深表怀疑,认为“兼相爱”不是稳定的偏好体系,并提出了三条否定理由。墨子对这三条理由分别给予了批驳。

第一,有人认为兼相爱是违反人性的事情,就像人的体力不足以一手托起泰山、一脚跨过大河。墨子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一手托起泰山、一脚跨过大河,这确实超出人的体力,而兼相爱、交相利是可以证明的,古代的一些圣王就曾经做到这一点(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济,可谓毕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况乎兼相爱,交相利,则与此异,古者圣王行之)^①墨子提供了一系列古代圣王的例子,说明兼相爱、交相利是曾经出现过的事实,因此,这种偏好没有违反人的本性。例如,大禹治水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好处,是兼相爱的典范。

① 《墨子·兼爱中第十五》。

第二,有人认为提倡“兼相爱”是一种不现实的举动。墨子用社会选择的思路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批驳。墨子提出一种假想的社会心理学实验,实验中让两个人分别贴上“兼”字和“别”字的标签。标“兼”字表示这个人的偏好是“兼相爱”,标“别”字表示这个人的偏好是“自爱不爱他人”。然后让其他人对这两个进行选择,选择的结果一定是标“兼”字的人受到拥戴,标“别”字的人被淘汰。墨子的分析表明,被社会淘汰的是“别”这种价值观而不是“兼”这种价值观。这足以表明,“兼相爱”并非是一种不现实的举动。^① 有人认为,也许社会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选择具有“兼相爱”品质的精英(士),但是不能选择具有“兼相爱”品质的君主。墨子采用同样的思路进行了批驳。不过,墨子的分析有个漏洞。社会固然可以根据价值观对首脑进行选择,可是这种选择是有一定周期的。如果周期较短,则选择会更为有效;如果周期很长,则有效性会大打折扣。

第三,有人认为,“兼相爱”有违孝道。孟子就是这么批判墨子的。《墨子》对此进行了反证:如果一个人爱自己的父母,他也愿意别人爱护自己的父母,而不希望别人来损害自己的父母。因此,这个人只能通过爱别人的父母,换取别人来爱自己的父母。如果这个人损害别人父母,他还能指望别人爱护他的父母吗?^②

《墨子》的这些批驳说明“兼相爱”可以是一种稳定的偏好体系。也就是说,在墨子的理论体系中,至少有两套偏好系统:“兼”与“别”。“兼”是集体理性,可以导致“交相利”的合作解;“别”是个体理性,会导致“乱”这种对抗解。

个体理性假定能够构成一个非常简约的理论体系。在个体理性假定中,人的自利偏好似乎是本能的,无需论证。可是,考察动物的习性可以发现,个体自利并非所有动物所有时刻的本能。很多动物有牺牲自己保护群体的本能,比如受到攻击的兽群中个别强壮的成年兽会故意吸引天敌,以便掩护兽群中的弱小同伴逃走。个体理性假定试图用自利来解释一切现象,包括解释集体理性的现象。这个理论的好处是,它可以尝试解释什么时候出现集体理性。例如,根据个体理性假定可以推导出出现集体理性的条件,即博弈需要无穷地重复下去。前面谈到,用个体理性假定解释集体理性现象,很多时候显得很勉强。原因就是

① 《墨子·兼爱上第十六》。

② 同上。

在很多情况下,即使博弈明显就快结束了,合作仍然能够维持。

墨子的解释很不一样。他把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当作两个独立的价值观体系(偏好排序),能够较为圆满地解释囚徒困境出现合作解与对抗解的机理。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在此基础上,墨家还必须考察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这两种价值观互相替代、转换的规律。否则,这一思想就会面临双重困惑。在理论上,这种思想就有陷入循环论证的嫌疑。比如,遇到“乱”就用“别”来解释,遇到“交相利”就用“兼相爱”来解释。在应用上,我们就无法知道如何推动合作的实现。也就是说,奉行“别”的人,永远不能实现合作。墨子深刻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否定“别”这样的价值观就一定要有办法改变这种偏好(非人者必有以易之),使人们的偏好从“别”变为“兼爱”(兼以易别)。^①到底怎样才能实现这种转变呢?墨子提出了向下建构法,非常出色地解决了这一理论难题。

墨子认为,“兼相爱”和“别”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建构出来的。这一点类似于建构主义对利益的看法。在建构主义者看来,人们的利益观,或者说偏好排序是被建构出来的。不过,他们并未明确声明偏好排序是从何处建构而来的,并似乎认为偏好排序是通过草根社会建构而来。因为建构主义者往往从一些草根社会的现象推测社会观念的变化,再由此推测国家行为。例如,从反核运动推测核禁忌,继而推测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②墨子同意偏好排序是建构出来的,但是主张偏好是自上而下建构而来的。具体来说,就是上级的偏好塑造下级的偏好。墨子列举了一系列上级塑造下级偏好的案例来说明这种向下塑造的可行性,包括晋文公好恶衣、楚灵王好细腰、越王句践好勇等。穿破衣服、饿肚子瘦身、轻视自己的生命,这都是不合人之常情的举动,但是在晋文公、楚灵王、越王句践的塑造下,他们的臣下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偏好。墨子进一步指出,这些匪夷所思的古怪偏好都能因为君主提倡而逐渐成为时尚。“兼相爱”与此类古怪行为很不一样,它是有回报的。爱他人也会得到他人的爱。因此,按照“兼相爱”做事是有好处的,做起来也就不难了。这样的偏好之所以不

① 《墨子·兼爱下第十六》。

② Richard Price and Nina Tannenwald, "Norms and Deterrence: The Nuclear and Chemical Weapons Taboos,"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26—134.

流行,是因为精英们不提倡也没有身体力行的缘故。^① 如果上级喜欢“兼相爱”这样的偏好,就可以用表扬、奖励的方法对“兼相爱”的行为加以提倡,用刑罚对“别”的行为进行吓阻。通过长期这样的塑造,人们对“兼相爱”这套偏好体系的认同就会内化,使之成为一种普遍的自觉行为,就像火往上蹿、水往下流一样,拦都拦不住。

墨子的这一理论体系包括三个命题:第一,对“乱”(非零和博弈中的对抗解)和“交相利”(非零和博弈中的合作解)成因的解释。墨子的解释是,不同的偏好体系导致了两种结果。他给出命题一:“别”(个体理性)会导致“乱”;“兼相爱”(集体理性)会导致“交相利”;第二,对“兼相爱”(集体理性)这种偏好系统的观察。他通过观察得到命题二:“兼相爱”是一种稳定的偏好系统,也就是说这种偏好能够被人们内化、而且稳定存在;第三,对向下建构现象的观察。他通过观察得到命题三:向下建构是一种强有力的偏好塑造过程,甚至能够建构出违反人性的偏好来。按照上述理论来推进合作,其分析脉络可以用图-5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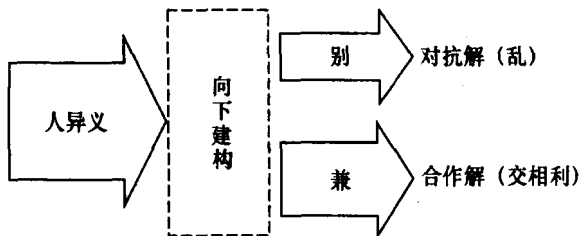


图-5 从“人异义”到“交相利”

图-5中,左边的大箭头表示人们的世界观原本非常混杂(“人异义”)。虚线方框表示向下塑造“兼相爱”价值观的过程。经过这个向下建构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人具备了“兼”的价值观(右边下面较宽的箭头),越来越少的人保持“别”的价值观(右边上面较窄的箭头)。具有“兼”的价值观的人们很容易实现合作(“交相利”),仍有少数人保持“别”价值观的人继续对抗(“乱”)。所以,按照墨子的思想,推进合作很重要是推广集体意识及相应的价值观。墨子的这套思路完全不同于现有的冲突合作理论,其思想对于寻找推进国际合

① 《墨子·兼爱中第十五》。

作、减少国际冲突的方案会产生重要作用。

五、非攻的安全观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墨家学派的和平主义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并非简单地反对一切战争和一切军备。墨家安全观的核心是“非攻”,意即“扩张战争之批判”。墨子关于“非攻”的理论框架非常独特而且具有时代先进性。“非攻”的安全观包括三个层面:道德层面;利益层面和实力层面。其中,利益层面是非介入性的直接利益分析;实力层面是介入性的利益分析,即通过改变实力对比来改变利益分配。

墨子清醒地认识到,战争绝非仅涉及实力和利益。在很多时候,大型战争,尤其是扩张性的战争需要道德层面的鼓励。战争发动者需要通过宣扬战争的合法性来进行战争动员和鼓舞士气,例如,宣扬受命于天和圣战。参加战争的人们互相激励,最后获得一种集体性的狂热,很多平时的道德规范会被暂时遗忘,很多平时谨小慎微的人会变得疯狂,人们会忽略扩张性战争的不道德性(不义),甚至为这种战争歌功颂德。在平时,一个人杀害无辜、抢夺财物,是再明显不过的不义行为。杀人越多,受到的道德谴责也越大。问题是,一旦杀人越货的规模扩大到一国攻打另一国的时候,很多人就转而对其歌功颂德(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①

墨子对扩张性战争的道德批判就是将人们的意识从集体狂热拉回到个体的平常状态。为此,他将战争的规模缩小到个人层次。在个人层次上,扩张性战争的不道德性(不义)就很明显了。不能因为扩张性战争杀人多,就把它看作是道德的。墨子把道德比作白色,把不道德比作黑色。不能因为见到的黑色少的时候,把黑色称作黑色;而见到黑色多的时候,就把黑色称作白色。②

墨子的这种道德批判是很有力的。在政治游说中,墨子多次使用这种批判

① 《墨子·非攻上第十七》。

② 同上。

手段。比如,在楚国计划攻打宋国的时候,墨子前去劝阻楚国的决策者,就分别两次使用了这一思路。与公输盘会见时,墨子掏钱请对方当杀手杀自己的仇人。自视很高的公输盘当然不干,表示自己恪守道德,不会杀人。墨子就说公输盘的道德是不杀少人,却杀多人(“义不杀少而杀众”)。与楚王会见时,墨子说了一个寓言。寓言中的人物有华贵的东西却去偷邻居粗陋的东西。墨子请楚王评价这个人,楚王脱口而出:“这人有偷窃毛病!”接下来,墨子从容地论证,楚国攻打宋国与这个有毛病的人一样。对这种道德批判,楚王和公输盘至少口头上都服气。^①

当战争机器启动之后,仅有道德批判恐怕是不够的。这一点在墨子游说楚国不要攻打宋国的案例中体现得非常清楚。尽管楚王和公输盘无法辩驳墨子的道德批判,但两人也没有因此放弃战争。原因在于,战争的利益驱动并未消除。墨子接下来就是进行战争的利益分析。

墨子认为,为了一场中等规模的扩张性战争,人们会耗费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进行准备。在此期间,各个阶层的人们都会耽误各自的工作。战争中,绝大多数武器装备难以回收,士兵大多还会因为非战斗原因(后勤、疾病等)死亡。一些强国(齐国、晋国、楚国、越国)虽然通过扩张战争获得了土地,但是,他们在战争中损失了人口。这些强国原本人少地多。战争的结果是:损失了原本不足的人口,扩张了原本富余的土地(是人不足而地有余也。今又以争地之故,而反相贼也,然则是亏不足,而重有余也。)^②。墨子的这段分析可以用现代经济学中的偏好理论复述出来。见图-6。

图-6中,横轴表示国家拥有土地的多少,纵轴表示人口的多少。虚线是两条偏好无差异曲线(等偏好曲线)。箭头表示战争造成的人口和土地变化。箭头的起点是战前的情形:人口少而土地多,因此,该点位于坐标第一象限的右下方。箭头的终点表示战后的情形:人口数量进一步下降,土地数量进一步增加。可以看出,战前所在的偏好无差异曲线位于战后的右上方,也就是说,即使获胜,发动战争的国家的总偏好也会下降。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说法,这种扩张战争使得国家总体利益下降,发动这种战争不符合理性(利益)的原则。有的文

① 《墨子·公输第五》。

② 《墨子·非攻下第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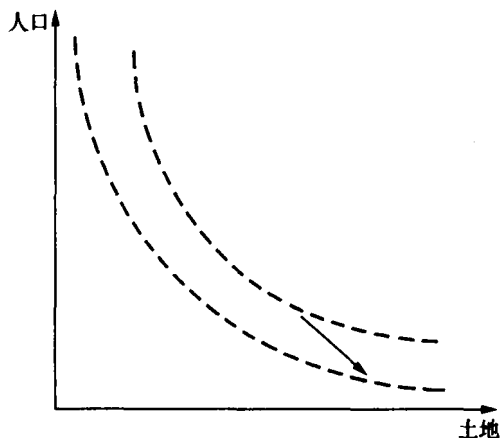


图-6 战争结果的利益分析

章指出,楚国攻打宋国可以增加人口和土地,因此,总体是获利的。^①可墨子并不这么看。他认为,楚国在获胜的情况下总体利益也是下降的。他说:“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②

墨子不仅从个体的角度进行利益分析,而且还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统计性的利益分析。这一点非常难得。他指出,喜好扩张的人会以楚国、越国、齐国、晋国等国为样板,因为这几个国家最初受封的时候面积都很小,但经过多年的扩张,它们都成为版图巨大的强国。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扩张是有利的。墨子运用统计分析,反驳上述看法。他认为,与楚、越、齐、晋等国同时受封的有上万个诸侯国,扩张成功的仅有四个。这说明扩张成功的概率很小,那么扩张有利的说法也就不成立了。^③

很多国家发动扩张战争最后损失惨重,但这并未阻止后来的国家继续这么做。原因在于,发动扩张战争的决策者往往认为,凭自己的实力能够很轻易地征服对方,以前扩张者蒙受的损失未必会在自己身上发生。墨子的上述利益分析是非介入性的,只考虑双方原有实力对比下的利益分配。这种利益分析还未彻底打消楚国决策者攻打宋国的念头。真正让楚国放弃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

① 钱永生:《对〈墨子·公输篇〉的博弈分析和语用分析》,第15—19页。

② 《墨子·公输第五十》。

③ 《墨子·非攻下第十九》。

墨子及其门徒的介入使得实力对比发生了对进攻者不利的变化。

如果攻防对比对进攻方有利,那么战争就更容易暴发;如果攻防对比对防御方有利,那么战争就更不容易暴发。这是现代攻防理论的结论,该理论属于所谓“防御性的结构现实主义”。^①按照这一理论,预防战争的方法是使得攻防对比更有利于防御方。墨家学者并没有明确地在字面上给出这一命题,但是,根据墨子及其门徒的“救守”行为,可以看出,他们是理解这一思路的。在非介入性的直接利益分析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墨子及其门徒只能介入进来,通过物质层面的努力,改变实力对比。他们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加强防御有效性,甚至直接参与防守,使攻防对比有利于防御方。其目的就是使扩张者不能获胜并蒙受损失。墨子在游说楚国决策者的时候,使用的就是这一思路。公输盘发明了云梯等攻城器械,使得攻防对比变得有利于进攻方。墨子则发明了对付云梯的守城器械。墨子和公输盘对这两种攻防武器的效能进行了多次模拟试验,结果表明,墨子的守城器械效能远胜于公输盘发明的攻城器械。而且,宋国在墨子门徒的协助下已经部署了墨子的守城器械。墨子及其门徒的介入改变了攻防实力对比,使得防御占优。在了解到这一事实的情况下,楚国只好放弃攻打宋国。

为了使攻防对比有利于防御,墨子及其门徒发明和整理了各种有利于防御的措施,包括防御性的装备、战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后勤和军事动员措施。这些措施大都被用于实战,并在后世不断受到军方重视。^②《墨子》因此被当代学者尊为与《孙子兵法》并列的经典兵书,前者为防御性谋略经典,后者为进攻性谋略经典。^③

墨子及其门徒基于“非攻”的信念集合在一起,运用科技知识进行军事安全问题分析,游说决策者,阻止扩张性战争。这一点与当代安全领域的很多非政府组织类似。例如,普格瓦什组织(Pugwash)就是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发起成

① Stephen Van Evera,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4, 1998, pp. 5—44; Charles L. Glaser and Chaim Kaufmann, "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4, 1988, pp. 44—83.

② 秦彦士:《墨家12种攻守方式》,第6—8页;陈逢治:《论墨子“善守御”的军事防御策略》,第27—31页。

③ 徐希燕:《孙子与墨子军事思想比较研究》,第69—75页;熊译文:《〈墨子〉的防御之术与古代军事防御理论之奠基》,第79—82页。

立的非政府组织,成员是来自各国的科学家。他们利用自身的科技知识,游说美、苏等国的决策者,敦促他们放弃军备竞赛,取得了一些成就。^① 墨家学派显然比当代科学家走得更远。墨子及其门徒不仅参与安全问题辩论,而且直接介入现实的战争当中,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得攻防对比有利于防御,由此打消扩张者发动战争的念头。

六、结论与启示

周王朝在自己疆域内的大部分地区实行分封制,分封的诸侯国具有较大的自主权。诸侯国的君主不仅对内实施自主的治理,而且也有很多机会和权利与其他诸侯国打交道。平王东迁之后,王室权威衰落,诸侯国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和权利与其他诸侯国打交道。它们不仅互相交往、结盟,甚至互相征伐、兼并,这就形成了类似于现代国际体系中国家间关系的“诸侯国间关系”。很多诸侯国在国内的部分地区也实行分封制,在诸侯国内部受封的豪强们也有类似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将这样的关系统称为“行政实体间关系”。春秋战国交替之际,当时的“行政实体间关系”出现了一些较为显著的变化,引起当时一些学者的担忧。他们对如何调整“行政实体间关系”提出了各种建议,墨子就是其中的一位。墨子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概念、思路 and 理论,用于理解和处理“行政实体间关系”,并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的学术流派。墨子及其门徒还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将其学说应用于实际,并由此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墨家学派也因此成为当时的主流学派(显学)。通过梳理《墨子》的相关论述,本文整理和概括了墨家学派关于“行政实体间关系”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这些概念、理论和方法包含一些重要的思想,可以启发我们推进当代国际问题研究。

首先,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墨翟的研究方法具有非常强的科学性。他非常重视而且能够娴熟地进行实证研究。《墨子》记载了两个重要的实证研究技巧:案例(样本)选择和统计。在实证研究中,案例选择直接关系到结论的可靠性。如果专门选择对自己假设(hypothesis)有利的案例,那么,在一般情

^① Pugwash 网站为:www.pugwash.org。

况下,这个假设就未必能够成立了。根据《墨子》记载,墨子非常注意这一点。在实证研究中,他尽量挑选那些不利条件下的案例,这样,结论的普遍适用性就很强。在正、反两方面的案例都存在的情况下,墨子能够运用统计学的原理进行定量评估,不仅仅关注那些对自己有利的案例。在墨子那里,统计学已经从具体技巧提升成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方法,既可以用来分析自然科学现象(药物疗效),也可以用来分析社会现象(扩张是否有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科学方法并非西方的专利,而是中国传统思想方法的一部分。作为当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者,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这些科学方法,推进当前的国际问题研究。

其次,《墨子》认为不同规模和层次的行政实体的行为是相似的。这一认识不同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将国家看作基本行为体的流行做法。将国家看作国际社会中的基本行为体,这是对国际社会现象的一种简化假定(assumption)。这种简化假定在一些场合(例如部分“高级政治”问题)是合理的,便于我们考察这种场合下的国际问题。但是,这种简化假定在另外一些场合(例如部分“低级政治”问题),则与实际情况差距较大。《墨子》关于行政实体行为相似性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推进国际关系中关于“低级政治”问题的研究,甚至还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一些“高级政治”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将视角放在非国家行为体上面。认为这些非国家行为体有着与国家类似的行为模式,这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关于国际关系新的认识。按照《墨子》的这一思路,我们还可摆脱关于先秦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是否是国际关系的争论。由于不同层次行政实体的行为是相似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观察较低层次的行政实体间关系来推测更高层次的行政实体间关系。

第三,《墨子》对囚徒困境这类非零和博弈给出了完全不同于现代博弈论的解释。借鉴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模型,现代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从个体理性出发,按照无穷次博弈的思路来解释集体理性的来源。其思路是,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无穷次博弈中,参与者(players)可以从个体理性推导出集体理性。否则,就会陷入囚徒困境。而《墨子》认为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是两套不同的偏好体系,个体理性容易导致对抗,而集体理性可以走向合作。这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理性主义的解释完全不同。按照《墨子》的理论,推进国际合作需要塑造国家决策者的偏好,使他们更偏重集体理性,而不仅仅关注个体理性。这

为研究和促进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墨子》还认为,偏好是可以建构的,这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墨子》重视自上而下的建构,而现代建构主义重视自下而上的建构。《墨子》的看法可以启发我们探讨偏好建构的路径。但这一问题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没有得到重视。

第四,《墨子》旗帜鲜明地反对扩张性战争。《墨子》认为,从个人层次到大规模的行政实体这个层次,发动扩张性战争都是不道德的。现代国际社会容易出现的一个迷失是,小规模行政实体的扩张行为被看作是不道德的,而国家扩张行为的不道德性则往往被忽略。《墨子》所体现的价值观和道德分析思路可以引领我们反思这一问题。墨子及其门徒也从利益分析的角度来劝阻扩张性战争。其理论和做法非常有特色,那就是介入性利益分析。他们的做法是,发展和扩散防御性装备,甚至亲身参加防御。他们的介入增强了防御有效性,改变了攻防对比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计算,使扩张无利可图,从而阻止扩张性战争。墨家的这种思路和实践对当代国际安全研究和实践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作者简介

邝艳湘 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讲师。2002年、2005年在湘潭大学分别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和法学硕士学位,2008年在外交学院获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相互依赖理论。

Email:kyx0713@163.com

向洪金 西安交通大学金禾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候选人。2005年在湘潭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Email:xhjin2006@163.com

李莉 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讲师。2009年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

Email:grass1118@126.com

李彬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1985和1988年在北京大学分别获技术物理专业学士和硕士学位,1993年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获理学博士学位。1993—1999年在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军控室工作,1999年8月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工作。最新著作为《军备控制理论与分析》(2006年)

Email:libin@mail.tsinghua.edu.cn

齐皓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候选人。2004年在黑龙江大学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2006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获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学位。研究兴趣为国际环境机制理论。

Email:qi-h06@mails.tsinghua.edu.cn

孙雪峰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1997和2000年在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分别获法学学士、硕士学位,2006年在清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著有:《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合著,2007年)、《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合著,2005年)。

Email:sunxuefeng@mail.tsinghua.edu.cn

杨原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2008级硕士研究生。

Email:yyir@163.com